

# 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及比较<sup>\*</sup>

张瑞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 在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其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也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在全国14个省份1037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与传统劳动经济学的60岁标准有所差异,分65岁以上农户和60岁至65岁农户来研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看,65岁以上农户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60岁至65岁农户对土地转出并没有显著影响,对土地转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60岁至65岁农户倾向于不转入土地,在中部地区,60岁至65岁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土地。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村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化的土地流转策略。

**关键词** 农村人口 老龄化 土地流转 区域差异

## 一、引言

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到城市打工和安家落户,一些老人留守在农村,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2014年中国乡村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为17.6%,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为11.5%,分别比城市高3.8个和2.6个百分点(魏后凯,2017)。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继续推进,青壮年外出务工比例持续增加,种地农民老龄化问题更加凸显。土地抛荒、闲置、生产效率低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此背景下,国家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障农业生产。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给农村土地流转带来哪些影响?老年农户倾向于转出土地、转入土地还是自给自足?这些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和关注的焦点。

许多学者认为,农村人口老龄化会带来更多的土地转出,如年轻户主更倾向于转入土地,年龄大的户主希望保持土地面积不变或转出土地(张忠明等,2014);由于受劳动能力的限制,户主年龄较大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土地,依赖土地租金生活(黎霆等,2009;闫小欢等,2013);在农村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险较完善的情况下,土地流转率较高(包宗顺等,2009);确权后,老年人更倾向于将土地转出(程令国等,2016);户主年龄对农户的耕地转入行为和转入耕地规模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易小

<sup>\*</sup>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业支持政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粮行为的影响研究(编号:16CJY049)”,作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杜志雄研究员、谭秋成研究员、郝亮亮研究员及匿名评审对本文提出的完善意见

燕等 2010)。

另一些研究则相反,农民的年龄越大,土地情结越重,土地流转的意愿越低(吴萌等 2016;乐章, 2010;杨卫忠 2015),因此,老龄化对于土地流转规模不具有显著影响(张四梅 2014;杨进等 2016; Zhong Taiyang 等 2008);当老年户主找不到家庭内部成员作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继承者时,就会选择不流转土地(Inwood 等 2012; Stefanie 等 2017)。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年龄与农地转出意愿呈倒“U”关系,农民转出意愿随年龄增长而提高,但到了一定年龄后,农地转出意愿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吴云青等 2016;吕世辰等 2011);户主年龄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土地转出没有显著作用(吴鸾鸾等 2014)。

由此可知,关于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土地流转关系的研究一直处于争论之中。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是继2008年\*以来农村土地流转的另一高峰期。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从《决定》中可以看出,推动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成为大势所趋。

那么,在农村人口老龄化加深的背景下,不同类型农户在土地流转行为上呈现出哪些新特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起到了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农村人口的年龄特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是否具有区域差异?关于上述问题目前还缺乏系统和全面研究,搞清楚这些问题,可以为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流转行为提供更明确的政策建议。

## 二、影响机制及数据来源

### (一) 农户类型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依据赫伯特·西蒙(Harbert A. 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人”假设,任何个人在一般条件下都只能拥有“有限理性”,人们在进行决策时不可能追求“最优”的结果,只能追求“满意”结果。不同类型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时,会从土地功能出发,进行“有限理性”的决策,从而追求自我认为“满意”的结果。一方面,基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从其生产价值上考虑是否进行流转;另一方面,基于土地的生活保障功能,从其社会价值上考虑是否进行流转。基于体力、技术水平、生活保障、情节、思想等方面的限制,不同类型农户会在是否流转土地的决策上做出选择(DU Wen-xing 等 2006),最终达到自我认为“满意的结果”。

具体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青年农户和老年农户在劳动能力、技术水平、学习能力、地租水平、收入状况、社会保障等限制因素方面均有所不同。面临这些限制因素,不同类型农户可以做出三种“有限理性”的决策,分别是:转入土地、转出土地和不流转土地。不同类型的农户根据自我限制因素,在三种“有限理性”决策中进行博弈和选择,最终达到自我“满意的结果”。

###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组在2014年7—8月进行的农户抽样调查,农户样

\* 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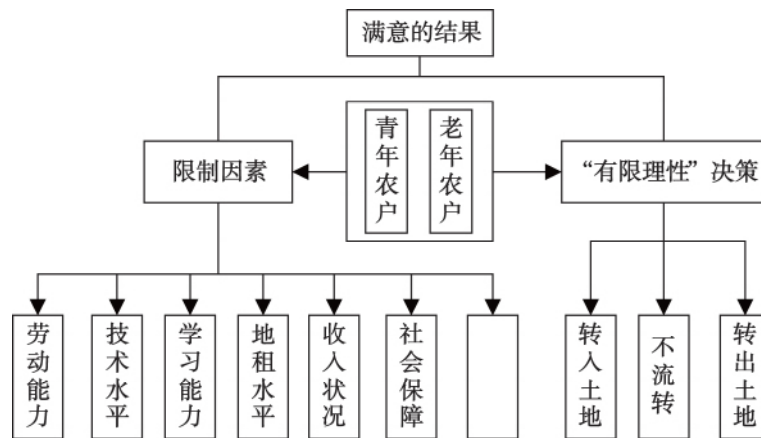


图1 农户类型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本是按照东中西部分层 根据系统抽样方法抽取得到 ,涵盖了全国 15 个省份的 11013 个农户; 调查内容主要涉及 2013 年农户个人层面的基本信息、就业信息以及家庭层面的基本信息、主要收支信息和一些专题性问题(如 2013 年土地和农业经营情况); 样本覆盖除新疆外的 14 个省份 ,经过对异常值处理后 ,保留了 14 个省份的 10370 个农户样本供本研究使用。农户样本来源省份的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在全国范围内 ,基于东中西部分层抽取的农户样本对本研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表 1 农户样本来源省份的分布情况 (个)

地区	农户样本的省份分布	各地区样本量分布
东部地区	北京( 348)、辽宁( 536)、江苏( 807)、山东( 1041)、广东( 895)	3627( 34.96%)
中部地区	山西( 567)、安徽( 811)、河南( 1045)、湖北( 752)、湖南( 839)	4014( 38.71%)
西部地区	重庆( 458)、四川( 909)、云南( 696)、甘肃( 666)	2729( 26.32%)

注: 农户样本省份分布一栏的括弧内为各个省的农户样本个数 ,各地区样本量分布的括弧内为各地区样本量占全国样本总量的比重

本文研究的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主要通过老年农户与中青年农户在土地流转上的差异来考察。本文将户主年龄作为农户老龄化的划分依据\* ,同时依据户主年龄对农户家庭做了三个层面的划分\*\* ,一是 60 岁以下 ,视为中青年农户; 二是 60 岁(含)至 65 岁(含) ,视为过渡农户; 三是 65 岁以上 ,视为老年农户。从样本数据特征看 ,60 岁以上农户为 3612 户 ,占总样本量的

\* 张忠明等(2014)、黎霆等(2009)、闫小欢等(2013)、杨进等(2016)等对农村土地流转或土地租赁的研究中 ,均将户主年龄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本研究中 ,笔者假设户主可以对家庭土地流转决策起到关键性作用 ,因此选取户主年龄作为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土地流转的划分依据

\*\*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 10% 或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 7% 时 ,该国家或地区步入“老龄化社会”。劳动经济学领域常常将劳动力年龄界定为 60 岁以下 ,60 岁以上的人口被视为退休人群(杨进等,2016); 学者研究农村老龄化或老年劳动力相关问题时 ,常常将 60 岁作为划分标准 ,如: 杨进等(2016)、胡雪枝等(2012)等 ,笔者认为这种年龄划分有可能不太适用于中国农村 ,由于农业生产的传统性和非技能性 ,60 岁至 65 岁的农村人口由于体力和能力的限制 ,从事非农业生产有局限性 ,但是他们还可以完全胜任并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 ,因此笔者对农户家庭做了三个层面的划分

34.83%,其中60岁(含)至65岁(含)的农户为1745户,占总样本量的16.83%;65岁以上农户为1867户,占总样本量的18%。中青年农户为6758户,占总样本量的65.17%。

从样本2013年农户类型与土地转入规模看(见表2),全国范围内中青年农户土地转入率比60岁以上农户高7.73%;从东中西部地区看,中青年农户的土地转入率显著高于60岁以上农户;从65岁以上农户和60岁(含)至65岁(含)农户的土地转入情况看,从全国范围内60岁(含)至65岁(含)农户的土地转入率比65岁以上农户的土地转入率略高,从东中西部地区看,东中部地区60岁(含)至65岁(含)农户的土地转入率比65岁以上农户的土地转入率高,西部地区则相反。从样本2013年农户类型与土地转出规模看(见表3),全国范围内与东中西部地区有一个共同特征:中青年农户的土地转出率显著低于其转入率。从65岁以上农户和60岁(含)至65岁(含)农户的土地转出情况看,从全国范围内其转入率和转出率的差异并不大,从东中西部地区看,其土地转入与转出存在显著差异。依据样本数据特征提出本文研究假设:农户类型与土地流转存在一定的行为逻辑,并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表2 2013年农户类型与土地转入规模比较(亩)

地区	总面积	65岁以上农户		60岁(含)至65岁(含)		中青年农户	
		转入面积	转入率	转入面积	转入率	转入面积	转入率
全国	57932.2	1329.7	2.30%	1405.58	2.43%	7220.67	12.46%
东部地区	17121.33	299.5	1.75%	518.3	3.03%	3194.77	18.70%
中部地区	21803.18	540.9	2.48%	699.2	3.21%	2696	12.37%
西部地区	19007.69	489.3	2.57%	188.08	0.99%	1329.9	6.70%

表3 2013年农户类型与土地转出规模比较(亩)

地区	总面积	65岁以上农户		60岁(含)至65岁(含)		中青年农户	
		转出面积	转出率	转出面积	转出率	转出面积	转出率
全国	57932.2	1200.36	2.07%	1332.63	2.30%	3935.49	6.79%
东部地区	17121.33	412.84	2.41%	267.08	1.56%	1373.05	8.02%
中部地区	21803.18	598.42	2.74%	943.15	4.33%	1813.04	8.32%
西部地区	19007.69	189.1	0.99%	122.4	0.64%	749.4	3.94%

### 三、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 (一) 变量选取

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有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两种形式,研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主要看老年农户与中青年农户土地转入行为和土地转出行为的差异,因此本文选取土地转入或转出面积作为农户决策的衡量目标。已有研究表明,户主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养老保险情况、土地流转价格、非农就业情况、是否加入合作组织等是影响土地流转的最关键因素(包宗顺等2009;黎霆等2009;张忠明等2014;吴云青等2016)。基于现有文献,本文通过加入农户类型的虚拟变量来研究农村人口老龄

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依据笔者对农户家庭三个层面的划分,将农户类型虚拟变量设定为:是否60岁(含)至65岁(含)的农户(过渡农户)和是否65岁以上农户(老年农户)。除此之外,假设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决策的其他主要影响因素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家庭收入与资产变量和保险变量。

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方面,选取了户主是否乡村干部、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健康状况、户主外出就业时间四个指标。假设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是村干部的、且外出就业时间越长的户主,见识更广且收入更多,更有可能参与农地流转(黎霆等 2009)。户主健康状况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有三种可能:一种是户主健康状况良好,希望通过转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来增加收入;另一种是户主健康状况良好,更倾向于外出打工,将土地流转出去;还有一种是,户主健康状况较差,将土地作为最低生活保障,不进行土地流转,因此农户健康状况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无法确定。

在家庭收入与资产变量方面,选取了农户可支配收入、土地流转价格和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估计现值三个指标。假设土地流转价格越高,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越小,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越大。假设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估计现值越高,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能力越强,越愿意转入土地。农户可支配收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农户可支配收入较高,有能力进行土地转入,扩大生产;另一种是农户可支配收入较高,农户更倾向于从事非农领域工作,将土地转出。

在保险变量方面,选取了户主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和是否参与专业合作社两个指标。假设户主加入了养老保险,就会削弱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转出土地的概率越大。参与了专业合作社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转出土地,可以获得入股或分红;另一种是农户成立并参与专业合作社,将土地转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土地流转面积,有些农户选择不进行土地流转,土地流转面积作为被解释变量有很多零值。这些零值有可能是农户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比如:有些农户想流转土地,由于种种原因(如:没有找到合适的转入方;担心转入方不想流转,而没有提出流转要求等)没能流转土地。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存在,样本选择就存在偏差,利用heckman两步法检验样本选择是否存在偏差的结果是Lambda均不显著,因此样本不存在选择性偏差。所以本文选用Tobit模型对农户“土地流转面积”进行估计,具体模型形式为:

$$Y = B_0 + B_1 D_1 + B_2 D_2 + B_3 R + B_4 Edu + B_5 Health + B_6 Time + B_7 Income + B_8 P + B_9 Capital + B_{10} Insurance + B_{11} Coop + B_{12} Region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Y是土地流转面积。D为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影响的最关键变量,即农户类型的虚拟变量,D<sub>1</sub>为是否65岁以上农户,D<sub>2</sub>为是否60岁(含)至65岁(含)的农户;R代表户主是否乡村干部;Edu代表户主受教育程度,Health代表户主健康状况,Time代表户主外出就业时间;Income代表农户可支配收入;P代表土地流转价格,即土地转入价格或土地转出价格;Capital代表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估计现值;Insurance代表户主养老保险参与情况;Coop代表是否参与专业合作社,region代表地区虚拟变量。各指标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4。

####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出的影响

从表5中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出的影响,也可以看出土地转出的其他主要影响因素。从地区虚拟变量的显著性看,农户进行土地转出决策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因此需要分东中西部地区考察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出的影响;从农户类型虚拟变量看,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与传统劳动经济学的60岁标准有所差异,因此非常有必要分65岁以上农户(老年农户)和60岁至65岁农户(过渡农户)来研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出决策的影响。

表4 各指标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样本量=10370)

变量	指标	指标解释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方差
被解释变量	土地转入面积	亩	0	400	0.963	7.73
	土地转出面积	亩	0	532.3	0.64	6.63
农户类型	农户类型虚拟变量一	≥60岁和≤65岁农户=1,其他=0	0	1	0.18	0.38
	农户类型虚拟变量二	>65岁农户=1,其他=0	0	1	0.17	0.37
人口统计学变量	户主是否乡村干部	是=1,否=0	0	1	0.05	0.22
	户主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	0	20	6.99	2.89
	户主健康状况	1=非常好,2=好,3=一般,4=不好,5=非常不好	0	5	2.20	0.95
	户主外出就业时间	月	0	12	2.74	4.39
家庭收入与资产变量	农户可支配收入	元	0	160万	45546.83	44939.97
	土地转入价格	元/亩	2	13000	433.31	342.60
	土地转出价格	元/亩	1	14000	756.13	501.40
	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估计现值	元	0	800万	6169.74	83975.04
	户主养老保险参与情况	参与=1,未参与=0	0	1	0.87	0.33
保险变量	是否参与专业合作组织	参与=1,未参与=0	0	1	0.03	0.18

从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看,农户类型虚拟变量一,即是否65岁以上农户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当农村人口老龄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土地转出是大势所趋。农户类型虚拟变量二,即60岁至65岁农户对土地转出并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劳动经济学中传统的对老龄化的界定标准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的传统性和非技能性,农业生产对劳动力体力和能力的要求较低,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龄被提高。从此处结论可以看出研究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出的影响以65岁为老年农户的划分标准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以60岁为划分标准可能会由于60岁至65岁农户对土地转出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得出不科学的实证结果。

其他变量对土地转出的影响与预期基本相符,但东中西部地区也有显著差异。从全国范围看,户主是否乡村干部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该变量对土地转出没有显著影响;在东部地区看,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并且户主外出就业时间越长,土地转出的概率越大,但从中西部地区看,两个变量均不显著。从全国范围和中部地区看,户主健康状况越好,土地转出的概率越大。

从全国范围内和东中西部地区看,农户可支配收入会显著影响到土地转出决策,农户可支配收入越高,土地的生活保障功能被弱化,土地转出的概率越大;从土地转出价格对土地转出决策的影响看,只有全国范围内和西部地区的土地转出价格会显著地影响土地转出决策,土地转出价格越高,农户越倾向于转出土地;从全国范围和中西部地区看,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估计现值会显著地影响土地转出决策,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估计现值越高,代表农户农业生产能力越强,越倾向于不转出土地。在全国范围内和西部地区,是否参与专业合作组织对土地转出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东中部地区影响

并不显著。

表5 农村土地转出面积 Tobit 模型的实证结果

变量	指标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农户类型	农户类型虚拟变量一 D <sub>1</sub>	2.78 <sup>***</sup> (3.58)	1.30 <sup>**</sup> (2.25)	3.09 <sup>**</sup> (1.70)	1.33 <sup>***</sup> (2.50)
	农户类型虚拟变量二 D <sub>2</sub>	0.12 (0.16)	-0.04 (-0.08)	-0.64 (-0.36)	0.14 (0.27)
人口统计学变量	户主是否村干部 R	-1.81 <sup>*</sup> (-1.45)	-0.81 (-0.87)	-1.66 (-0.56)	-1.11 (-1.30)
	户主受教育程度 Edu	0.10 (0.99)	0.19 <sup>**</sup> (2.30)	-0.20 (-0.87)	0.06 (1.01)
	户主健康状况 Health	0.44 <sup>*</sup> (1.51)	0.26 (1.13)	1.02 <sup>*</sup> (1.52)	-0.18 (-0.93)
	户主外出就业时间 Time	0.20 <sup>***</sup> (3.38)	0.12 <sup>**</sup> (3.08)	0.18 (1.19)	0.02 (0.51)
家庭收入与资产变量	农户可支配收入 Income	2.5e-05 <sup>***</sup> (4.67)	8.55e-06 <sup>**</sup> (2.91)	5.87e-05 <sup>***</sup> (3.14)	1.51e-05 <sup>***</sup> (2.97)
	土地转出价格 P	0.0011 <sup>**</sup> (2.30)	3.28e-05 (0.09)	-7.44e-05 (-0.06)	0 <sup>***</sup> (4.54)
	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估计现值 Capital	-1.74e-05 <sup>**</sup> (-1.65)	-2.99e-07 (-0.07)	-1.587e-04 <sup>***</sup> (-2.79)	-1.83e-05 <sup>**</sup> (-1.94)
保险变量	户主养老保险参与情况 Insurance	0.24 (0.30)	-0.12 (-0.21)	3.15 <sup>*</sup> (1.45)	-0.37 (-0.83)
	是否参与专业合作组织 Cop	-6.20 <sup>***</sup> (-3.61)	-1.34 (-1.08)	-3.99 (-0.85)	-4.76 <sup>***</sup> (-4.25)
	地区虚拟变量(是否东部地区)	1.31 <sup>**</sup> (1.81)		—	
	地区虚拟变量(是否中部地区)	2.50 <sup>***</sup> (3.58)		—	
	样本量	10370	3627	4014	2729
	P 值	0	0	0	0
	对数似然比	-10338.00	-3344.62	-4425.25	-1969.34

说明: \*、\*\*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弧内为 t 值,下同

(二)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入的影响

从表 6 中 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入的影响,也可以看出土地转入的其他主要影响因素。从地区虚拟变量的显著性可以看出,农户进行土地转入决策同样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因此需要分东中西部地区考察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入的影响;从农户类型虚拟变量看,在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类型农户对土地转入的影响差异较大。

从全国及东中部地区看,农户类型虚拟变量一,即是否 65 岁以上农户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由于老年农户的技术水平和劳动能力等都比较差,他们不倾向于转入土地。农户类型虚拟变量二,即 60 岁至 65 岁农户对土地转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该变量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东部地区 60 岁以上农户不倾向于转入土地;在中部地区 60 岁至 65 岁农户对土地转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中部地区 60 岁至 65 岁农户是倾向于转入土地并从

事农业生产的。中部地区多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作物的生产对技术水平和劳动能力要求较低,60岁至65岁的农户对农业生产和土地转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此处结论可以看出研究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入的影响以65岁为老年农户的划分标准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以60岁为划分标准就会由于中部地区60岁至65岁农户对土地转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得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入无影响的结论。

表6 农村土地转入面积 Tobit 模型的实证结果

变量	指标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农户类型	农户类型虚拟变量一 D <sub>1</sub>	-1.92* (-2.05)	-15.38*** (-4.86)	-3.76** (-2.14)	-2.98 (-0.92)
	农户类型虚拟变量二 D <sub>2</sub>	-0.23 (-0.17)	-5.77*** (-2.12)	2.76** (1.81)	-0.78 (-0.28)
人口统计学变量	户主是否乡村干部 R	11.39*** (5.75)	18.57** (4.63)	5.53** (2.23)	9.43** (2.29)
	户主受教育程度 Edu	-0.48*** (-2.64)	-1.50*** (-3.63)	-0.47** (-2.12)	0.52* (1.51)
	户主健康状况 Health	-1.10** (-2.06)	-3.24*** (-2.67)	0.37 (0.60)	-1.45 (-1.31)
	户主外出就业时间 Time	-1.09*** (-8.55)	-1.67*** (-6.95)	-0.51*** (-3.36)	-1.26*** (-3.75)
家庭收入与资产变量	农户可支配收入 Income	6.74e-06 (0.63)	-3.11e-05* (-1.55)	6.55e-05*** (4.05)	-9.73e-06 (-0.28)
	土地转入价格 P	3.49e-05 (0.03)	0 (0.59)	-0.01* (-1.74)	4.139e-04 (0.16)
	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估计现值 Capital	6.48e-06** (1.64)	4.73e-05*** (3.20)	6.58e-07 (0.15)	1.285e-04*** (2.95)
保险变量	户主养老保险参与情况 Insurance	0.31 (0.22)	-0.70 (-0.24)	1.71 (0.87)	-0.57 (-0.22)
	是否参与专业合作组织 Coop	5.25** (2.19)	-4.51 (-0.68)	0.24 (0.06)	12.23*** (3.53)
	地区虚拟变量(是否东部地区)	3.14** (2.41)		—	
	地区虚拟变量(是否中部地区)	4.52*** (3.57)		—	
	样本量	10370	3627	4014	2729
	P值	0	0	0	0
	对数似然比	-7694.15	-2549.73	-3165.73	-1903.80

说明:\*、\*\*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弧内为t值

其他变量对土地转入的影响与预期基本相符,但东中西部地区也有显著差异。从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看,户主是否乡村干部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和东中部地区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不转入土地,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转入土地;这与东中西部地区就业空间、农业支持政策倾向有较大关系,东中部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非农就业空间较大,挣钱途径较多。从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看,户主健康状况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户主身体状况越差,越不会转入土地,但该变量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看,户主外出就业时间越久,户主越不会转入土地。



农户可支配收入对土地转入的影响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农户可支配收入越高,越不倾向于转入土地,中部地区农户可支配收入越高,越倾向于转入土地;从土地转入价格的影响看,中部地区土地转入价格越高,进行土地转入的概率越小;从全国范围和东西部地区看,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估计现值越高,农户生产能力越强,越有可能进行土地转入,该变量在中部地区对土地转入的影响不太显著。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并不会对土地转入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与全国80%以上的农户都参与了养老保险有很大关系;从全国范围和西部地区看,参与了专业合作社会农户的土地转入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东中部地区并不显著。

## 五、结论与政策内涵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组在2014年7—8月进行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土地流转问题,通过对土地转出和转入决策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户类型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与传统劳动经济学的60岁标准有所差异,因此非常有必要分65岁以上农户(老年农户)和60岁至65岁农户(过渡农户)来研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第二,65岁以上农户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三,60岁至65岁农户对土地转出并没有显著影响,60岁至65岁农户对土地转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该变量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中部地区该变量对土地转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其他变量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看,户主是否乡村干部、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外出就业时间、农户可支配收入、土地流转价格、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估计现值、是否参与专业合作社会对土地流转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不同变量对土地流转影响的地区差异较大,因此在农村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土地流转策略:

一是东部地区土地流转工作保持自然有序进行。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加深有利于推动土地流转。政府需在规范土地流转形式、流转方背景考察、期限、合约、租金等方面增加监管和督查力度,以免农村老龄化加深背景下大规模大范围的土地流转带来的违约、毁约、社会不稳定等问题。

二是中部地区做好土地流转的引导、规范工作。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核心区,应本着“提质增效”原则,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的宣传和引进工作,引导老年农户科学种田及合理流转土地,以提高土地生产效率,增强产业竞争力。

三是西部地区土地流转工作的进行必须依靠财政政策支持。要加大政府对西部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同时解决好特色产业、特色农业的销路问题。从“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角度出发,发展特色产业,帮扶群众,加大力度为当地产业可持续性发展铺好路、搭好桥。这不仅有利于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还有利于解决农村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问题。

## 参 考 文 献

1. Du Wen-xing, Huang Xian-jin, Zhai Wen-xia, Peng Bu-zhuo,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Land Transfer—Case Study of Shanghai, Nanjing and Taizhou in Changjiang River Delta,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16(1), 24~31, 2006
2. Inwood S. M., Sharp J. S.: Farm persistence and adaptation at the rural - urban interface: succession and farm adjustment, Journal of Rural Study, 28, 107~117, 2012
3. Stefanie Duesberg, Pat Bogue, Alan Renwick.: Retirement farming or sustainable growth—land transfer choices for farmers without a successor, Land Use Policy, 61, 526~535, 2017
4. Zhong Tai-yang, Zhang Xiuying, Huang Xian-jin, Impact of Labour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Land Use Conversion at Rural Household Level Based on Logit Model,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18(4), 300~307, 2008

5. 包宗顺,徐志明,高珊,周春芳.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09(4):23~47
6. 程令国,张晔,刘志彪.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吗?管理世界,2016(1):88~98
7. 赫伯特·西蒙(美)著;詹正茂译.管理行为(珍藏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3)(2014.11重印)
8. 胡雪枝,钟甫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2(7):29~39
9. 乐章.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及解释——基于十省份千户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0(2):64~69
10. 黎霆,赵阳,辛贤.当前农地流转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9(10):4~11
11. 吕世辰,李华.准市民参与耕地流转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部地区省内流动的准市民群体的考察.中国农村经济,2011(4):57~64
12. 魏后凯.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战略.中国乡村发现,2017
13. 吴鸾莺,李力行,姚洋.农业税费改革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基于状态转换模型的理论及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4(7):48~60
14. 吴萌,甘臣林,任立,陈银蓉.分布式认知理论框架下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EM模型的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去实证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9):62~71
15. 吴云青,罗倩,密长林,蔡为民,刘瑶.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基于天津市578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6):69~74
16. 闫小欢,霍学喜.农民就业、农村社会保障和土地流转——基于河南省479个农户调查的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3(7):34~44
17. 杨进,陈志钢.劳动力价格上涨和老龄化对农村土地租赁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16(5):71~83
18. 杨卫忠.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户羊群行为——来自浙江省嘉兴市农户的调查数据.中国农村经济,2015(2):38~51
19. 易小燕,陈印军.农户转入耕地及其“非粮化”种植行为与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0(6):2~10
20. 张四梅.人口结构变动视角下的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经济地理,2014,34(8):131~136
21. 张忠明,钱文荣.不同兼业程度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的调查与实证.农业经济问题,2014(3):19~24

责任编辑 张宁